

譯載

鄧小平在法國的歲月

王楓初 (Nora Wang) 原作
陳三井 姚淑芬 合譯
羅玉絲

(譯自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原題為 *Den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pp. 698-705.)

鄧小平已經成爲好幾本傳記的主人翁^①，但有關於他早年在法國的歲月，絕大部份的傳記却都語焉不詳。然而，他在法國的五年時光是不可能默默而逝的，因爲就在法國那段期間中，他在政治上首度嶄露頭角，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些事實是不容辯駁的，但此一段插曲，就一般的傳記而言，只有簡單一筆帶過，而且往往互有出入。例如，包華德 (Howard, L. Boorman) 所編的「民國名人辭典」^②說：「鄧氏自從在成都上過一個留法預備學校之後，即前往上海，並在一九二〇年初由上海乘船赴歐洲^③。並沒有任何紀錄提到鄧氏在法國進入任何學校或大學就讀；至於他從事何種工作也不清楚。」正如包華德所指出，鄧氏在法國停留期間，純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及（單純地提供技術）替「赤光」印刷這兩件事著名^④。據來自蘇俄的消息和鄧氏

註① 特別如：周荀編，「鄧小平」（香港，一九七九）；Chi Hsin, Teng Hsiao-Pi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Hong Kong: Cosmos Books Ltd, 1978)；和田武司，田中信一，「鄧小平傳」（中文版，香港，一九八一）。

註② Boorman, H.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I (Columbia, 1970), pp. 252-53.

註③ 事實上，鄧小平與一羣四川同學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搭「博爾多斯」號赴法。參閱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年)。

註④ 「赤光」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巴黎出刊，代替「少年」而成爲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的機關刊物。

註⑤ 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57).

本人對斯諾(Edgar Snow)的說法^⑥，以及克萊恩(D. W. Klein)與克拉克(A. B. Clark)兩人合編的「中共名人傳記」^⑦，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據他們說，鄧小平曾介入一九二一年勤工生佔領里昂中法大學事件^⑧。在一九二二年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於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後不久，他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至於離法時間，據「中共名人傳記」說是一九二六年，而「民國名人辭典」則列為一九二五年。中文資料方面直到最近，也未能提供較清楚的說明。例如，紅衛兵(Red Guards)^⑨所出版的一本傳記中提到，鄧氏加入中國共產黨竟是在一九二五年！根據這項資料，鄧氏住在蒙達集(Monlargis，巴黎南方約六十哩處的小鎮)，受雇於一家工廠，從事橡膠鞋類的製作，並幫同事燒飯。

即使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六年間鄧氏的行事無法完全重建，特別是較早的幾年仍然模糊不清。但根據法國檔案^⑩，針對若干重點加以檢查仍有可能，尤其它可以補充一些空白。

或許鄧小平在前往法國時採用了化名——鄧希賢(法國文件上拼成 Teng Hi Hien 或 Teng Si Sien)^⑪，一般官廳和警察僅僅知道他的名字而已。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鄧在馬賽上岸^⑫，他與一批來自四川的年輕人在勤工儉學會的贊助下，從上海出發到法國求學並工作^⑬。鄧氏是這一羣人當中年紀最輕的一個，年僅十六歲而已。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外僑登記簿(可能在馬賽)上填明，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二日出生於四川，雙親為鄧文明和鄧恬怡(譯音)^⑭。

這以後的三年，小鄧一直逗留在法國，追溯他的活動輪廓是可能的，但年表上仍有若干空白。大致情形如下：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八日

搭「博爾多斯」(Porthos)號抵達馬賽。
辦理外僑登記。

註⑥ Klein, Donald W., and Clark, Anne B. (eds),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Vol. II, (Harvard, 1971), pp. 820-21.

註⑦ 第一次大戰後，各國協議將庚子賠款用於教育用途，一個顯著的成果，就是里昂中法大學的設立，由中法雙方共同遴選中國學生就讀。一九二一年學校開學前，一羣勤工生在共黨份子領導下，先行佔領該校。最後出動法國鎮暴警察鎮壓，並導致一〇四名勤工生之被遞解出境。

註⑧ 譯文收在「中共文化大革命」(*Rev. Cul. dans la Chine pop.*)，巴黎，一九七四年，頁一七五。

註⑨ 這些資料保存在法國檔案館，屬於內政部的有文號 F712906 的「共產主義在中國與德國」(一九二〇~二五)和文號 F713438 的「中國人在法國」(一九一四~二七)，以及前殖民部的資料。

註⑩ 鄧小平的姓名曾引起若干爭執。某些作者可能根據李璜一九七三年在臺北所出版的回憶錄，認為鄧小平實際姓關。然而，這可能是李璜自己搞混了。來自四川的同一羣學生中另有關時杰其人，在法國警方紀錄中也提到過他。

註⑪ 據張允侯前書，「博爾多斯號」於十二月十三日抵達馬賽。

註⑫ 有關勤工儉學的史料，請參閱張允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七九~八二年)，三冊。

註⑬ 入境號碼為一四〇。

一九二一年一至三月 就讀於拜耶爾 (Bayeux) 中學^⑭。

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二二年二月 在巴黎地區一家工廠工作，住在哥倫比 (La Garene-Colombes) ^⑮。

一九二二年九月 在共黨份子發動下，參加里大事件^⑯。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抵蒙達集，在市政廳外僑登記簿上登記的職業是體力勞動者。

九月三日 離開蒙達集，前往沙蒂昂 (Chatillon-Sur-Seine) ^⑰；就讀於沙蒂昂中學^⑱。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 回蒙達集，開始在胡欽孫 (Hutchinson) 橡膠工廠工作^⑲。

三月七日 離開胡欽孫工廠，仍留蒙達集。

六月十一日 離開蒙達集，據稱重返哥倫比^⑳。

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 住在巴黎地區，從事工廠工作，特別是在比昂古 (Billancourt) 的雷諾 (Renault) 汽車廠工作^㉑。

一月七日 離開比昂古 (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以來，他都住在該鎮 Castèna 街三號)，經由德國前往蘇俄^㉒。

從上述年表可知，仍有許多地方模糊不清或不夠確定。這可能是因為，幾乎所有法國方面的資料都是根據警方的紀錄而來。假如從這些資料上顯示，鄧的成為突出人物僅是在一九二五年夏天之後，那是因為在那段時期前，他的政治活動毫無疑問地相當謹慎小心^㉓。事實上，據中國方面資料指出，早在一九二二年鄧即很明顯地同情並附和當時的共產主義活動。真確的時間是他在那一年加入少年共產黨，而於一九二四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夏天成立的駐歐支部)。然而，除開他的技術責任外，起

註⑭ 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法國的動工檢舉檔案，原存國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的現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現已全部移交國家檔案館，其編號為 47AS (譯者另按)。

註⑮ 在蒙達集市政廳所作聲明，見一九二二年市政廳資料的外僑登記簿。

註⑯ 參閱註⑩。如果鄧小平參加了這次事件，無疑是小心謹慎的。因為除了領頭的趙世炎一、兩個例外，涉及本案的學生事實上均被遞解出境。

註⑰ 蒙達集市政廳資料。

註⑱ 沙蒂昂是靠近迪松 (Dijon) 的一個小鎮。這次停留是根據鄧氏離開蒙達集時所作的聲明而得。

註⑲ 胡欽孫紀錄，一九二三年該廠僱工登記簿。

註⑳ 同註⑱，並見蒙達集市政廳資料。哥倫比亞位於巴黎西南郊。

註㉑ 國家檔案館 (簡稱 AN)，F¹2900, F¹3438。

註㉒ 同註㉑。

註㉓ 這當然不是一項通則，以周恩來為例，至一九二四年夏天離開法國時為止，他一直是中共駐歐支部與國民黨歐洲總支部的主要負責人。而警察機關很遲才注意到鄧小平，直至一九二五年一月才開始偵查他的活動。A. N. F¹2900。

先他似乎在這兩個組織中並未擁有任何地位。初加入中國共產黨，鄧氏實際負責的僅止於印刷，主要工作是印製共產黨宣言以及「赤光」刊物^②。由於這項工作，他在同志間贏得一個稍帶譏諷意味的稱號——「印刷博士」^③。他一直擔任這項工作直到離開法國為止，有事實為證：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警察搜查他位於巴黎郊區的最後住所，發現房間內遺有兩臺附有刻板的油印機設備、捲筒以及幾包印刷用的紙張^④。

從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開始，鄧氏已成為法國地區中國共產黨活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這種竄升主要是因為幾次對公眾的演說而來。所謂公眾，是指有限的中國僑民中的同情者。一九二五年八月，鄧希賢被選為法國地區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那次的選舉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獲得確認^⑤。如前所述，自一九二五年八月以來，鄧氏即住在巴黎西南郊的比昂古小鎮 Castens 街三號——一家專供中國居住的旅館。事實上，鄧氏和他的兩個同伴——來自上海的共產黨員楊品蓀以及傅鍾合住五號房間^⑥。傅鍾和鄧一樣來自四川，當一九二四年夏天周恩來離開法國之後，曾經出任中國共產黨駐歐支部的書記^⑦。這三個人把時間奉獻在同樣的活動上。據警方報告說：「有兩個人和鄧希賢同住並抱持相同的政治見解。當鄧氏外出時，他們也形影不離地相隨」^⑧。表面上傅鍾居於比較次要地位這一事實，使我們對於傅、鄧兩人在中國激進圈中的個別重要性感到不解。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問：究竟是誰在庇蔭誰？是鄧小平被推擁出來保護傅書記呢？抑或他在一九二五年已經扮演著主要的角色？

事實可能如此。根據警方資料，鄧小平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伊西·列·穆林諾 (Issy-les-Moulineaux) 主持一項中國共產黨會議，雖然他並不是主要演講人。共有二十五個人出席這次會議，討論主題是「重建中國共產團體的必要」^⑨；由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示威運動所導致的遞解放逐，已使該團體顯得迷惘混亂。十一月十五日，鄧氏再度主持一項會議，這次集會主要是為紀念國民黨鬥士——王京歧。王在被法國驅逐出境後，於十月間死在被遣送回國的船上^⑩。在這個場合，共有四十七個中國

註④ 同註④。

註⑤ 國家檔案館至少藏有鄧小平以銅板蠟紙印出的兩份小冊子，其時間為一九二五年六月。

註⑥ A. N. F. 12900。

註⑦ 得自一九二六年末在馬賽——上海航線的一條船上所獲文件（殖民地檔案）。

註⑧ A. N. F. 13438。

註⑨ 傅鍾是三十年代紅軍的政治幹部，接近張國燾路線；後來在延安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並領導「抗大」的政治部門。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他是「人民解放軍」的高幹。關於他到法國的情形，參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晚報》的談話。

註⑩ A. N. F. 13438。

註⑪ A. N. F. 12900。

註⑫ 王京歧是國民黨歐洲總支部的領導人，患有肺病的他，雖然從未成為共產黨員，却與共黨相當接近。他雖因病得以摒除許多政治活動，但仍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示威事件後遭到驅逐。

人聚集在貝勒市 (Belle Ville) 波耶爾 (Boyer) 街的一間會堂中^②。警察眼線誤以為這些是來自色佛 (Sèvres) 或聖克盧 (St. Cloud) 的中國人。鄧小平先致開幕辭，宣布開會的主旨，並為十一位發言者的話做出結論。依據警方的紀錄，鄧氏曾如此表示：「我們呼籲在座諸人，繼續從事反抗帝國主義的戰鬥，並在心中永遠銘記我們已故的王京歧同志」^③。其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在同一地點由「旅法華人援助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行動委員會」^④所發起的會議中，鄧氏向與會的七十人（包括兩個安南人）演說^⑤。在這次集會上，共產黨員表示了他們的願望，希望促成他們所支持的馮玉祥將軍和蘇俄的接近。鄧小平並主張與蘇俄政府親善以對抗帝國主義。會議的結果，通過向駐法公使陳錄致送一份最後通牒，要求陳錄：（一）鄭重向法國政府及各國駐巴黎的外交團抗議他們的帝國主義；（二）致電中國各駐外使節，向其駐在國政府抗議帝國主義以及派遣戰艦和軍隊到中國的行動^⑥。整個看來，對中國外交官充滿直接的威脅。

鄧希賢也因另一種方式涉及一樁秘密行動而引起法國警方的注意。事實上，他和另一位共產黨員以及兩個中國民社黨黨員，包括被稱為 Paul Yang 的楊塞道（譯音），被懷疑幕後策畫一項針對中國青年黨，特別是青年黨領導人何魯之的告發運動。何魯之和他的青年黨朋友，在中國僑民中素以反共著稱，被激進份子控告，在六月的示威行動中出賣了他們。前述四人甚至被控企圖暗殺青年黨的領袖。「民社黨和共黨的領袖正公然地尋找有能力做案的個人」^⑦。這樣的計劃，即使存在（僅係警方片面處理青年黨的恐懼而來），終究沒有實現！

現在該是我們扼要地審視下一九二五年六月事件的時候了。正因此事，或更正確地說是它的不幸結果，大致可以讓我們理解鄧氏何以能在警方注視下竄起的原因。那時，中國僑民的革命運動主要由一小組所領導，其中最著名的成員可能是任卓宣。任氏也是四川人，一九二三年成爲中國共產黨法國分部的書記。因此，他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巴黎中共黨徒及其附和者襲擊巴比倫街 (Yue de Babylone) 中國公使館的主要策劃者。當天，約有一名中國人爲表示對上海「五卅」事件的支持，而佔領

註② A. N. F. 12900。

註③ Ibid.

註④ A. N. F. 13438。

註⑤ 這個委員會，名爲「旅法華人行動委員會」，或稱「旅法華人援助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行動委員會」，在共黨煽動下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成立，以支持五卅運動。

註⑥ 馮玉祥此時正掉轉槍口對抗他以前的盟友，被日本買通的張作霖。

註⑦ A. N. F. 12900。

了中國政府在法國的外交館舍³⁹。此一事件激盪了法國輿論若干時日，但純屬象徵性的意義，結果引起普遍的鎮壓風潮，實際上「整肅」了中國僑民中的最激烈份子。經過迅速的調查，也可能得自若干中國人對當局的協助，共產黨徒及其夥友的身份被證實了。不久之後，他們之中約一百名離開了法國，內有四十七人是被驅逐出境的，其餘的則是自願離開。任卓宣和三個同伴被收押繫獄，聽候審判，而在適當期間仍須離開法國。這些事實可以說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各種急進會議何以出席率不高的原因，更可能解釋鄧小平這樣一直扮演著技術性角色的人，何以必須追隨前人之步伐走到幕前的原因。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二五年，這位「印刷博士」不過二十一歲而已⁴⁰。時勢推動他爬升至共黨運動的最前哨地位，同樣說明了他在法國僅有六個月的短暫居留。他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特別是涉嫌共謀對付何魯之事件，很快引起警方搜查他的房間，這種搜查只是逮捕政治嫌疑犯的一部份。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的早上，比昂古三家專供中國人居住的旅館，包括 Crestens 街的一家，都受到警察的搜查。他們發現五號房間空棄著，好像這天以前就如此。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印刷設備外，房間的三個居住人遺留下書籍、期刊和各種紙張⁴¹。

因此可以肯定，那是一月七日鄧小平和傅鍾離開巴黎經由柏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如事後警察總局報告所說的：「似乎這些人感到被懷疑而匆忙地溜走了」⁴²。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法國分部的歷史地位，因此變得益形重要了。他是以所謂的「第三代」領導者角色出現的。第一代領導者大都在一九二一年的里昂事件中離開了法國；第二代的領導者（除周恩來於一九二四年自行離去外）之被迫離開，則是一九二五年夏天事件的結果。然而可能主要由於環境的改變，所能盡力的不過是一場最後的、短暫的「困獸之鬪」。無論如何，法國檔案中並無任何資料，能使我们對鄧氏的行為和思想有足夠清楚的概念，以瞭解他的領導能力或特殊的政治哲學。在缺乏任何更進一步的資訊下，我們對於前年表所提供的史實重建，應該感到滿足！

除開他的年齡（他抵法時，比同一條道路的大部分中國學生年輕二、三歲），鄧的旅程行踪也是很典型的一個。大多數的勤工儉學生遭遇同樣的人生浮沉，缺乏經濟來源；上省級中學，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經常的變動移居，這是他們的共同命運。在

註³⁹ 詳情請參閱作者即將問世新作——〔打陳錄，巴黎的五卅運動〕。這次示威運動的領導人任卓宣，於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脫離共黨。使用筆名「葉青」，他成爲三十年代的一位反毛理論專家，後來是國民黨的主要宣傳理論家。

註⁴⁰ 然而，警方根據外表，估計他大約二十三歲。若由一九二二年在巴黎所拍攝的一張著名照片看來，更令人感到驚訝！這張照片可以指認出少共法國分部的幾位黨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書重刊過這幅照片。

註⁴¹ 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的警察報告，A. N. F. 13438。

註⁴² 與他們有關的驅逐命令，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下達的，名單上另加「等候通知」字樣。參閱 A. N. F. 14655 [一九二五～二八年遞解出境外僑一覽表]。

思想急進化方面，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五年期間，大約有二百人成爲急進的共產黨徒^④，只有極少數對於左派一無同情。也有少數人在到法國之前便具有明顯的政治思想^⑤，但大多數人的情形並非如此。這一點，急進者的行動發生了部分的影響，我們猜想，也與法國的環境同樣地有所關連。大部份參加勤工儉學的中國人，對於在法國一面追求較高層次的教育，一面尋找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都充滿幻想。實際上，一九二〇年代危機重重的法國很少有工作可以提供給這些外國人，即使在應徵時他們的資格也欠缺；他們的中國文憑並不能給予他們在大學就讀的地位，所以必須退而在若干中學所開的特別班上學。爲此，他們在攢積學費上遇到相當大的困難。他們之中大部份的法語說得不夠靈光，加上所遭遇的物質困難，造成一種自然的趨勢，他們喜歡羣居在那些容易進入的學校或雇用外國工人比率較高的工廠（如雷諾汽車廠）四週。這種集中（過半數的中國僑民住在巴黎地區）使得急進者的工作更爲容易，因爲這許多年輕中國人所受的挫折，毫無疑問地爲他們的任務提供了背景。至於與法國工人或他們政治性組織和工會之間不可避免的接觸，是否也扮演一個角色？確定這方面的事情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正如鄧氏的個案所顯示，中國勤工儉學生明顯地有一種「劃地自限」（Keep themselves to themselves）的傾向，他們的政治活動大致也以僑民爲限^⑥。

在急進程度方面，鄧的傳記同樣提供了範例。從資料檢查所得，讓我們對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有粗略的瞭解，顯示那是從少數一些基本資料（大部份源自蘇俄）滋長而來。據警方房間搜查報告指出，鄧和他的同伴擁有大量的中法文共產黨宣傳小冊子（例如中國工人、孫中山的遺囑、共產主義ABC等）、中文報紙，特別是在莫斯科所出版的中共報紙——「進步」^⑦。事實上，在一九二〇年代，無論國民黨共產主義ABC，都不足爲奇。同樣的，鄧氏在他的早年生涯，先以年輕急進的少共黨員身份加入共黨，繼而順從聯合戰線的指示成爲國民黨員，最後遵照中共中央的訓示前往莫斯科，也沒有什麼不尋常之處。往後的事件發展可能帶給我們這種印象，認爲那是最後這個階段留下最深刻的痕跡。然而，無論鄧小平或其他許多同伴^⑧，我們不應低估他們在法國逗留期間的重要性，因爲這段歲月扮演了一種不可或缺或導引角色。

註③ 包括共產黨員與少年共產黨員。

註④ 有關周恩來的活動，參閱《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一九八一年）。

註⑤ 中國人與法共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問題甚多。理論上，法共透過其殖民組，對初期的中共興趣並不高，曾在其草創時期數度參與並在一九二五年事件後提供法律上的幫助。但有關這種幫助的重要方式和方式，卻乏足夠的資料來加以說明。

註⑥ 這種閱讀資料的貧乏，不僅說明了這些人的窮困，也表明了他們並非是長期不變的代理人（指共產主義信徒）這一事實；即使他們遭遇過短暫的失業，但大都在工廠工作。任卓宣住處在六月事件後被搜查，發現藏書頗多，則是一項例外。

註⑦ 如果說對許多急進的中共黨員而言，法國意味或代表前往蘇俄的「候車室」，就某些情況來說，這就是一種訓練的標誌。自一九三三年四月開始，沒有一個中共黨員不是渴望著遵照指示，經由蘇俄返回中國。